

纪实名义下的历史虚构

——评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鲍远福

内容提要：阿来对藏民族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文化境遇的书写总蕴蓄着虚构的力量。在被宣称为纪实长篇的《瞻对》中，阿来仍以他擅长的虚构方式与诗艺技巧，在“纪实”与“虚构”的语义断裂处，以叙事重组了瞻对的历史与现实。

关键词：纪实 历史虚构 阿来

藏族作家阿来自创作以来，仅有三部长篇面世。《尘埃落定》虽让他一举成名，他却始终对写作保持谨慎。他认真地教书、办刊（《科幻世界》），并坚守着对藏民、藏区、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精神追思。“从《尘埃落定》到《空山》再到《格萨尔王》，阿来的长篇小说都以藏汉文化的交汇、碰撞为题材。”^①这些长篇“屈指可数”，却又屡屡在当代文坛激起涟漪。也许，阿来展示的不仅是写作速度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缘于他的写作姿态和他始终坚持的文学世界观。”^②这种“慢写作”状态最终成就了其文艺观：一种对藏文化的精神守护和对现代文明的诗学建构混融共生的文学世界观。在以文学世界呈现藏区的爱恨情仇与是非善恶后，阿来又将诗性的笔墨游弋到虚构的对面：他用“纪实”笔法为我们揭橥了充满传奇的康巴社会两百年的变乱始末，这就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③。

历史纪实与文学虚构

《瞻对》的传奇缘起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夹坝”事件：大清的一队官兵在换防瞻对的途中遭到抢劫，资财尽失。“夹坝”是藏方言中的特殊词汇，在康巴土话中，它原指当地藏民所携之

① 吕学琴：《阿来长篇小说十年研究综述》，《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

② 贺绍俊：《三部小说，三重境界——阿来的文学世界观一瞥》，《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1期。

③ 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下文简称《瞻对》，文中所引原文仅随文标注页码，不再另注。

藏刀,此刀以牛皮作鞘,长约二三尺、宽约三四寸,刃口锋利;后来它又指携带此刀劫掠商旅的强盗、劫匪;最后它就在当地人口耳相传中被赋予某种浪漫色彩,大致与汉语中“游侠”的意义相近。在《瞻对》中阿来以诗人的敏锐与细腻,紧紧抓住这个色彩奇诡的词语,通过卷帙浩繁的文献梳理,为读者呈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对瞻对人“夹坝”的多次讨剿的史实,并结合历史钩沉的方式,在纪实与虚构的语义“缝隙”中重构了瞻对历代豪酋(班滚、洛布七力、贡布郎加和女土司青梅志玛)的传奇故事,再现了他们的“游侠”气质。由此,《瞻对》在浓厚的浪漫主义和虚构情境中为我们“重构了汉藏交汇之地的藏民艰难而又独特的生存境域,并借此传达了阿来对于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①。

着力复现藏文化高度自省的精神世界并主动接纳现代意识对于藏族同胞生存境况的改造一直是阿来文学创作思想的主导,正是这种文艺观使得阿来的创作超越了本土化的狭小视野而融入了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潮流中,这使作家笔下的地域风情和宗教世界所建构的“藏族书写”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坛都占有一席之地。在《瞻对》中,阿来通过揭秘瞻对土司的“前世今生”而思考其文化精神,并将其纳入现代文明的创新与传承中加以省察,显示出一个对“母体文化”有着道义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思,更彰显了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诗学追问。所以,“阿来在创作伊始就树立了较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他的作品因此一方面注意追寻藏民族的族群记忆”,“一方面则运用世界眼光来审视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未来走向,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为中国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进行新一轮对话提供了可能。”^②在《瞻对》的纪实笔墨中,这条历史反思的脉络清晰可循。

在书中,阿来关注的虽然是瞻对人两百年来的生存境况,但做足了考据功夫的他,还将充满灵性的笔触瞄准了当地民众口耳相传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佛理偈语和民间歌谣,把它们作为历史纪实的语义参照系,通过这些艺术载体,作家成功地将历史纪实与文学虚构有机融合起来,从而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形象生动、富有张力、兼具纪实精神与浪漫气息的审美世界。关于这点,最著名的例子是“独眼豪酋”贡布郎加的故事。阿来并不局限于官方史料,而是调动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佛教偈语等资源,以虚构方式陈其事、画其像;在纪实文体的语义缝隙外,作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迥异于正史描述的、具有反抗精神和神异色彩的民间英雄形象。可以说,对贡布郎加形象的处理使阿来在历史纪实与文学虚构之间为《瞻对》的审美世界找到了平衡点,并使这个形象获得了意义“增殖”。此外,作家还对各个历史时期活跃在瞻对的其他豪酋、土司、喇嘛、活佛甚至盗匪的生存状况进行历史探秘,在各种离奇诡异的故事

① 洪治纲:《〈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一部川属藏民的精神秘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

② 吴道毅:《阿来关于藏族的叙事与生存》,《中国民族》2012年第1期。

和传说的渲染下,虚中有实,实中见虚,使得瞻对这个特殊的嘉绒藏族群体两百年的传奇历史显现出神秘的异域色彩。

通过虚构的方式对瞻对藏区生存境况进行现代性反思,应属阿来在《瞻对》中的艺术创新,这种把历史史料与英雄传奇相结合的方式,夹叙夹议,虚实相间,形成了“纪实”与“虚构”互动并存的叙述格局,有力地增强了这个纪实文本的审美张力。《尘埃落定》中藏文化精神与拉美魔幻风的融合、《格萨尔王》中的史诗气度和现代神话的“共在”、《空山》中精神救赎和文体实验的诗学同构等这样一些虚构艺术的方法在《瞻对》这样的纪实文学中也被阿来成功地延续了下来。

主观“介入”与以史为鉴

主观“介入”历史是《瞻对》纪实书写的重要特征,这使阿来笔下的瞻对故事呈现出强烈的自省精神。首先,阿来以大量史料为基础,较为翔实地记述了自康熙皇帝至新中国建立两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不服约束的瞻对土司多次用兵的史实。阿来并没有钻进故纸堆,变成卖弄学识的老学究,而是围绕瞻对为什么被视为“铁疙瘩”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心理因由的主线来展开情节,并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建立了连贯的逻辑链条,为扎实地还原“瞻对变乱始末”提供了诗性反思的学术理路。

在主观“介入”历史的过程中,阿来自觉地超越了纪实与虚构的二元维度,他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深入地反思了瞻对土司豪酋的前世今生,并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与细腻,理性地揭橥了川边和西藏千百年来不思变革、停滞不前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状况及其对当地人(包括“夹坝”的藏民、犯上作乱的土司头人、身居高位的喇嘛,乃至西藏教宗十三世达赖本人)深陷历史文化悖论而不思融入现代文明的生存悲剧。此外,阿来以纪实笔法叙写了瞻对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的窠臼,而是处处表现出对于川边藏地人民生活现实生存境况的密切关注;他以批评家的姿态积极地“介入”了笔下的历史,不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中肯客观的分析评价,还能从巨细无遗的历史脉络中超脱出来,站在促进藏文化发展传承的现代视域中去反省这段历史,这对于像阿来这样擅长以虚构方式呈现藏民族生存图景的作家来说,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甚至超越。

其次,在主动“介入”历史的过程中,阿来在大量的纪实描述中也不断地表现出对瞻对“历史归零”的反常状态的深刻警醒与有力批判,这使《瞻对》这个纪实文本流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阿来在叙述中不断地对瞻对地方豪酋只知争权夺利、纵兵劫掠、策动战端、蚕食弱小,而不思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革新民族文化,愚昧保守的历史境遇施以辛辣的讽刺;

他对瞻对人民千百年来因循守旧、粗鄙落后、无法融入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尴尬现实更是痛心疾首。我们看到,阿来通过瞻对一地的微观历史样貌的铺陈与记述,以点带面,见微知著,把文化探寻和诗意追思的笔触辐射到整个藏文化区。所以,在《瞻对》中,阿来将笔墨由瞻对而触及康巴、川边、滇藏、青海、蒙古的藏区,乃至中国和世界,广泛涉猎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和文化等不同层面,这既显示了作者对叙事的驾驭能力,也流露出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强烈关注。

除此以外,在《瞻对》中,阿来还站在社会现实的角度,带着讽喻的口吻揭示了现代社会整个藏区宗教信仰体系的裂变与崩塌,他以主观“介入”的方式关照了藏区宗教信仰体系中的各种“异化”现象,并将其与汉地“伪宗教风尚”的种种“怪现状”加以比较,还以宏观的视野不断地拷问这些易变的深层次原因,充分地表达了一个有思想的叙事建构者对于藏民族陈陈相因的精神“秘史”、文化“病史”以及愚昧落后的“生存纪实”的尖锐批判:“藏区社会不正常,寺院太多,僧人太多,宗教影响力太过强大。……内地社会也不正常,寺院都开发成旅游景点,俗人去庙里上香祈求,都只为满足现实中一些过于实在的愿望。官员和商人面对僧人神佛,内心的企求更是不可告人。”(第 162 页)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信仰是许多民族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当代文学中,民族的信仰危机成为一些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神性的解体和信仰的坍塌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民族文化危机之一。”^①阿来并没有规避这种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而是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加以披露,并在创作中自觉地予以审思,字里行间,既流露出批判的锋芒,又带有十足的警示意味。

最后,阿来对瞻对地区“历史归零”状态作出了简明而深刻的总结:“土司与土司相争”,“寺院与土司相争”,“藏军和政府相争”,“多数历史,都只是书写他们争雄的过程,似乎这就构成了全部历史。”(第 272 页)瞻对土司与地方豪强及中央政府的争战之所以频频发生,不过是一种信仰缺失、道义沦丧和人心不古的映照,正如阿来在《格萨尔王》中揭示的那样,这是潜伏于人心的“魔性”被释放了出来,影响了世道人心,使人们成为欲望的奴隶所造成的恶果。“因为‘魔’的存在,人们有了权欲、财欲、情欲;因为‘魔’的存在,人们相互猜忌、欺诈、攻讦;因为‘魔’的存在,人类开始掠夺、屠杀和战争。”^②而在瞻对变乱中,受苦受难的永远是被各路统治者视为草芥或棋子、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贫苦民众;统治者因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攻讦,从未有人考虑过要在川边藏地发展经济、促进工商、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于是,藏边的历史终因不能顺应世界发展大势而陷入千年的停顿,这是整个藏区的悲剧,也是无数生活在

① 张晓琴、罗长风:《民族文化危机的书写与反思》,《民族文学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② 洪治纲、肖晓堃:《神与魔的对话——论阿来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南方文坛》2010 年第 2 期。

像瞻对这样不思进取的民族地方的下层民众的悲剧。千百年来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故事的瞻对,彻底地成为现代文明的弃儿,而千千万万被统治的川属藏民则成为历史演变的牺牲品,阿来以悲悯之心对他们施以无限同情。

综上,“阿来以一种别样的视角书写出了历史变迁中文化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信仰和秩序所遭遇的挑战。他站在被淘汰、被遗忘的边缘化角度叙述历史,不是以昂扬乐观的心态为历史吟唱一往无前的赞歌,而是以复杂矛盾的心绪、挽歌的笔调叙写旧文化、旧信仰、旧秩序和旧制度在历史进程及日常生活中的黯然隐退,在已成既定事实的制度更替中渗透进了涵蕴深广的宿命意识。”^①而在我们看来,阿来希望通过对《瞻对》藏民“精神秘史”和文化“病史”的自觉批判来警醒世人,以瞻对反叛始末的“微观历史维度”来建构文学批评的“宏观历史视野”,以史为鉴,从而使《瞻对》的创作流露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文化乡愁与寻根焦虑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瞻对》的“纪实与虚构”还带有浓重的文化寻根企图与精神乡愁意味,这正好与阿来的诗人气质契合,也与作家在创作中自觉追求突破有关,他不断提醒读者,瞻对以及整个藏区两百年来虽然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但也有很多进步势力和积极因素在这里推动着历史进程,这些都是值得后世借鉴的历史遗产。

但与此同时,阿来站在反思者的角度也指出了瞻对历史的反动性:一股暗流一直主导着瞻对乃至整个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宗教信仰,剥夺了瞻对以及整个藏区融入现代文明的权利,这对于所有的藏族人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藏传佛教穿越历史长河而进入近现代社会,却在商业浪潮和世俗欲望的双重冲击下一步步溃败与变异。同时,藏传佛教的信仰体系传入内地之后也发生了“蜕变”,宗教信仰中教导人们执着追寻崇高彼岸世界的积极力量被尘俗的欲望“异化”为唯利是图的生存手段,阿来指出,这既是宗教的不幸,也是对那些或真或假地信奉宗教的人(无论汉、藏)的莫大讽刺。

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在《瞻对》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内在张力,那就是隐藏在阿来批判笔锋之下的对藏文化内核的“寻根意图”与精神焦虑。阿来在《瞻对》的纪实文本中,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为读者追溯了藏民族文化的源头,揭示了藏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个源自于格萨尔王拓垦时代的精神-信仰体系及其传统为什么会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陷入迷途乃至完全溃灭?阿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学术钩沉,他遍访瞻对故地,远走藏文化区的各个僧俗遗迹、佛教寺庙和政治文化中心,力图重构瞻对变乱始末背后所依托的信仰体系和精神

^① 杨艳伶:《阿来的意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文化之“根”的全貌。然而,作家的这趟文化寻根之旅最终却是充满了遗憾的:源自格萨尔王时代的优秀文化基因竟然在历史的传承中逐步消亡了,甚至连专为格萨尔王打造兵器的英雄部落也“沦落”为商业文化的附庸,他们打造的所谓“兵器”也失去了锐利锋芒而变成“媚俗”的商品:作为外地游客“到此一游”的符号象征,其所承载的藏族文化质朴、剽悍而神秘的精神内涵已消失殆尽;而那些被赋予“游侠精神”的“夹坝”英雄的后代也逐渐丧失了祖先的浪漫与辉煌,他们不再拥有威猛彪悍的心灵世界和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或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追逐金钱名利的市侩群体(“假活佛”行骗内地),或是固守着荒诞不经的陈规陋习(“兄弟共妻”),或是为了经济利益而盲目地开采资源、毁坏环境(今日瞻对的地方领导为开发旅游行业而挖空心思)……而最让作者浮想联翩又无限怀念的强悍民风,也只剩下舞台上飘忽不定的舞蹈形式,孤独地呈现在电视屏幕的“模拟图像”中。也许,作者所深爱的藏民族文化真的已经变成“一个漫长时代遥远的浪漫化的依稀背影了”!(第 307 页)对此,作家的心中充盈着无限的“文化乡愁”与精神焦虑。这种“乡愁”,不是余光中那种对于大陆故土的缅怀与守望,也不是莫言那种对民间世界的讴歌和激赏,更不是张承志那种对于伊斯兰民族文化的倾诉与追思,而是鲁迅那种对精神故乡孜孜以求的“呐喊”与“彷徨”。在这种夹叙夹议的纪实笔触中,阿来不无唏嘘地流露出对于哺育他成长的藏文化彻底走向迷失的惆怅与失落,如鲁迅一般,他不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是“恨其不进,痛其不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纪实描述”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精神重构”与“心灵复现”。

身分认同与意指裂变

通过《瞻对》这个纪实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许能够看到阿来的写作诚意,对于这部新作的审美价值,我们也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除了对藏文化的坚守、批判、反思与“寻根”之外,显然还有一些潜藏于文本乃至阿来创作意图背后的东西值得玩味。一方面,在《瞻对》中,我们看到了纪实的努力,但是这个力度似乎还不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实际上给人留下了以纪实名义进行虚构的印象:阿来还原了瞻对变乱的历史始末,但是其案牍工作似乎做得太多、太过,虽然没有沉入故纸堆,却有机械搬弄历史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瞻对》中,恰恰是这虚构的一面成就了阿来。虚构给人以模棱两可的感觉,却又显得言有尽而意无穷,而虚构的艺术张力也许正在于此,所以我认为本书最精彩的篇章是关于贡布郎加等瞻对豪酋传奇人生的夸张叙说。这是因为,在这里,阿来充分地调动了一个艺术虚构者所特有的创作才能和审美情思,富有创见地以瞻对当地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佛教寓言来修饰和润色这些民间英雄的个人事迹,从而增加其形象的神

秘色彩,也使得《瞻对》这个以“纪实”为名的作品悄悄滑向虚构指涉的一端。在《瞻对》中,阿来还是用他最拿手的艺术虚构为读者呈现瞻对的“心灵秘史”,其中流露的也并不完全是史家的纪实风格与科学精神,而是由文学虚构的外壳所包裹的“历史镜像”。

此外,《瞻对》中显然还隐藏着另一个重大主题,那就是以不同面貌呈现的“身分认同”悖论。对此,陷于高度创作热忱的阿来也许并不自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第一,瞻对游离于藏文化区的核心地带,但统治这里的贵族势力却在信仰上奉藏传佛教为宗,迫切地希望被西藏地方政府认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藏僧俗政权并没有将瞻对的身分认同焦虑当回事,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奇异的“他者”,并以此身分不断地对瞻对进行经济、文化、宗教渗透,甚至以武力入侵并掠夺这里的资源。他们在潜意识中始终是将瞻对排斥在藏文化区域之外的,对其内在的原因,阿来似乎并未做深入探讨,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研究瞻对变乱始末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知,阿来在建构《瞻对》这一文本时,并未很好地处理这个身分认同悖论,以至于暴露了自己作为文学虚构者对于历史文化内在逻辑的某种无力感。第二,瞻对两百年的传奇故事其实也是充满着愚昧保守、僵化落后与野蛮凶残的,这恰恰是旧制度与新文明激烈冲突的结果,瞻对对现代文明的抗拒与对旧有精神体系的墨守,自然也就造成了现代文明对它的放逐,瞻对两百年的生存悲剧与此紧密相关,阿来虽然在行文中一直对藏边、瞻对的落后面貌进行历史探秘和现代反思,但是未能超越其小说家的视野,诗艺性过分张扬,乃至削弱了文化哲思的力度。

不过,《瞻对》一书无意间透露出的这些“身分认同”悖论的信息,激发了我们探讨的热情,更诱发了我们对于阿来“藏文化书写”的文化思考,如果这种思考能在评论界引发连锁反应的话,那么,这也可以算是阿来这个以纪实的名义进行历史虚构的文本留给我们的最意想不到的“精神遗产”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文艺理论创新”(项目编号:10YJC751002)阶段性成果。

(鲍远福,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新华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